

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银行信贷研究^{*}

许坤 苏扬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银监会在2013年实施的逆周期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政策效果,政策前后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信贷增长,而且还降低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信贷风险。说明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逆周期操作效果显著。②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因逆周期资本监管对风险权重的不同影响,监管压力较大银行在信贷结构中更侧重于抵押贷款、长期贷款和个人贷款。研究结论为我国开展逆周期资本监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逆周期资本监管; 监管压力; 银行信贷

中图分类号: C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565(2016)03-0097-09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Regulatory Pressure and Bank Loan

Xu Kun & Su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effect of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on bank credit by constructing double difference model(DID), which is implemented by CBRC in 2013 and can be seen as a typical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loan growth of banks with greater regulatory pressure, but also decrease credit risk of these banks. Operating results of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are obviou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because of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on the risk weights, banks with greater regulatory pressure will focus more on mortgages loan, long-term loan and Personal Mortgage loan. Our study has lai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Regulation; Regulatory Pressure; Bank Loan

2010年9月,巴塞尔Ⅲ推出了区间范围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之一,以进一步提升银行的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2011年,我国也出台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正式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并于2013年起开始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已有文献对巴塞尔Ⅱ资本监管的银行资产负债顺周期性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必要性,并在框架设计、计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文泓,2011;杨柳等,2012;陈忠阳和刘志洋,2014)。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逆周期资本监管的主要目标是在信贷过度扩张后金融系统经受压力时,在不损害银行系统清偿能力的前提下保障信贷供给(即防止经济下行时的信贷紧缩)(G20 2009, FSA 2009a, IMF

2009)。巴塞尔Ⅱ资本监管顺周期性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企业融资渠道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二是风险权重逆经济周期变化(Saurina和Trucharte,2007);三是银行面对更高风险权重时,为了满足资本监管的要求,不是寻求外部股权融资,而是收缩资产负债表,减少信贷供给,并影响资产组合与风险配置^①。对巴塞尔Ⅱ的顺周期性,主要纠正方法之一就是调整输出端,包括对风险权重或资本要求进行移动平均等平滑处理(Cordy,2006)、按宏观经济指标或金融市场指标进行调整(Repullo et al.,2010),巴塞尔Ⅲ逆周期资本监管就属于此类纠正办法,并通过信

^{*}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银行信贷研究”(JBK160168)资助。

^① 对于第一和第三个前提条件,Blum和Hellwing(1995)在研究资本监管的宏观经济影响时就已指出,目前均已大量研究。

贷供给渠道发生作用^[1]。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资本缓冲要求无疑影响了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约束。银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满足监管要求,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和减少风险加权系数较高的资产持有(Park, 1999)。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通过股权补充资本金面临很大困难,为了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只能改变资产组合与风险配置^[2]。这一观点也从Kopecky和VanHoose(2006)提出的“监管成本”假说中得到佐证。以Repullo和Suarez(2009)的企业信用状况顺周期变化为前提,假设银行没有外部股权融资渠道,逆周期资本监管会对银行信贷资产组合与风险配置产生影响,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信贷资产增长影响。理论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引入具有逆周期特征资本要求,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阶段抑制信贷过度增长,在经济下行阶段缓解银行信贷的收缩,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放大作用,进一步抵消巴塞尔Ⅱ顺周期效应(李文泓和罗猛,2010)^[3]。二是对信贷资产内部不同类型贷款调整影响。信贷资产增长仅是从银行信贷资产与其他资产运用之间比较,而信贷资产内部之间不同类型贷款也会受到逆周期资本监管影响。巴塞尔协议规定了不同类型信用资产适用不同的风险权重。风险权重逆经济周期变化在现实中成立是巴塞尔Ⅱ资本监管顺周期的前提条件(Gordy和Howells, 2006; Saurina和Trucharte, 2007)。逆周期资本监管会对银行风险权重产生影响(邹传伟,2013)^[1]。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很可能导致银行对于不同风险权重信贷资产持有的调整。因此,在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研究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影响的政策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银行持有资本的成本是昂贵的,在利润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理性银行会使得实际资本与法定监管要求保持一致,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预防动机等,银行一般会持有高于监管要求的资本缓冲。多数学者经验证据表明,随着巴塞尔Ⅱ的实施,银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呈现的负向变动关系大大加强(Stolz和Wedow, 2011; Tabak et. al, 2011)。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产生的资本要求被称之为逆周期资本缓冲。与一般资本缓冲的持有动机不同,逆周期资本缓冲并不由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定,而是由宏观审慎管理部门从全局出发自上而下进行设置

而计提。强制计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不能用于预防违反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防范其受到惩罚。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导致了银行面临的监管资本要求增加,在银行资本缓冲一定的条件下,部分占用资本缓冲导致了银行监管压力增加。监管压力对银行信贷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监管压力越大,鉴于监管惩罚和破产成本考虑,银行信贷高冒险可能性越小(Milne和Whalley, 2001; Montgomery, 2005)。监管压力测试结果发现,银行持有适量超额资本更有助于管理信贷风险(Peura和Jokivuolle, 2004)。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监管压力越大,为了提高预期收益,银行往往采用“背水一战”,银行信贷高冒险可能性越大(Rime, 2001; 孔德兰等, 2008)。考虑到资本监管压力与逆周期资本监管、银行信贷之间影响关系(江曙霞和任婕茹, 2009; Nada Mora和Andrew Logan, 2010; 吴玮, 2011; 李维安和王倩, 2012),本文试图在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背景下,实证研究监管压力渠道对银行信贷的影响,以检验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一、相关文献回顾

资本监管确实会影响银行信贷(Park, 1999)。2008年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风险的测度和监管成为学术界和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由于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具有顺周期性,逆周期资本监管开始引入,许多学者不再局限于一般资本(充足)监管研究,开始关注逆周期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的影响。

(一) 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增长

纵观前期文献,对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多。Rashmi和Benjamin(2014)^[5]基于金融体系、银行、投资者及借款人对于宏观审慎管理的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反应,提出了影响信贷的两个因素,一是政策变化会改变银行总成本进而影响信贷供给;二是政策变化会影响借款者信贷需求。Shekhar et. al(2012)^[6]认为资本监管能够控制信贷总供给的有效性有赖于两点:一是资本要求的变化需要影响到被监管银行的贷款供给;二是信贷的替代品(遗漏)不能完全抵消被监管银行的信贷供给。邹传伟(2013)^[1]通过1980—2010年全球企业违约率数据,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发现巴塞尔Ⅲ逆周期资本监管针对企业信用状况驱动的

信贷顺周期性效果较好,针对资产价格驱动的信贷顺周期性效果有限。曹森(2014)^[7]通过模型分析了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影响,发现在巴塞尔Ⅲ的资本监管框架下,当监管机构的资本规定对商业银行的借贷行为有约束作用时,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新增资本规定可以降低银行信贷和企业投资的顺周期性。朱太辉(2012)^[8]主要是针对信贷内生性扩张对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效力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在信贷扩张内生性较强的经济环境中,针对信贷供给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的效力将被弱化。

(二) 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风险

纵观前期文献,有关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水平关系的研究很少,更多集中于研究一般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Shrievas和Dahl(1992)^[9]构建了基于资本行为与风险行为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提出银行风险水平会根据资本要求做出外生调整。Kahane(1977)、Koehn和Santomero(1980; 1988)使用均值-方差分析框架对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进行了分析,模型推论表明,资本要求提高了银行资产组合风险。Calem和Rob(1999)^[10]构建了银行资产选择的动态模型,并使用美国银行业1984—1993年的数据对模型参数拟合,结果表明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Bichsel和Blum(2004)^[11]使用1990—1999年瑞士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研究了风险变动与银行资本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资本水平与风险变动之间正相关。吴玮(2011)^[4]选取了我国1998—2009年间175家商业银行,通过含有监管压力指标的回归模型表明,2004年以前,资本变动与银行风险变化正相关(不显著),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水平变化产生显著正影响;2004年以后,资本变动与银行风险负相关(不显著),资本监管压力对银行风险水平变化产生显著负影响。

(三) 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结构

纵观前期文献,有关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结构关系的研究文献稀少,少量研究集中于一般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信贷结构关系。Haubrich和Wachtel(1993)^[12]使用美国银行业向联邦金融检查委员会(FEIEC)报告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资本监管以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组合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后商业银行降低了信用贷款,增加了政

府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持有。吴玮(2011)^[4]研究了资本监管制度与银行信贷结构的变动关系。研究结论表明,资本监管制度实施后,高资本水平银行偏向发放企业贷款,而低资本水平银行偏向发放个人贷款。陈伟平等(2015)^[13]利用我国12家上市银行数据研究了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的影响,认为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加强,银行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的调整对资本监管的反应更为敏感。

纵观国内外文献,对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信贷之间问题的探讨较多,对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问题的探讨刚刚起步,且已有研究更多体现在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本文也发现了一些有待深化的问题。在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研究中,更多的还是集中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定性讨论,缺乏数据支撑和实证研究。有关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多是基于其对信贷周期性增长影响的分析,这只是银行信贷的一个表现,而对有关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关系的探讨很少涉及。然而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增长研究只是在纵向角度衡量了银行信贷,除此之外,银行信贷还包括横向角度衡量的信贷结构等要素。本文力图系统研究逆周期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增长、信贷风险、信贷结构这三个要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时间不长,本文拟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运用DID模型,主要以监管压力因素为切入点,研究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对我国银行信贷影响。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由于在信贷高成长阶段,违约率往往会下降,进而导致银行资本的顺周期问题。逆周期资本监管旨在提高银行额外的资本,加强银行在面对潜在信贷损失的恢复能力。与此同时,额外的资本增加意味着银行信贷更为昂贵,从而降低信贷增速(Christoph和Catherine 2014)。近几年来,国内外普遍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特殊环境中,为了检验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的关系,本文主要考察我国银监会在2013年实施的逆周期监管对银行信贷的政策效果,这一政策前后可以

视为一个典型的“准自然实验”,鉴于此,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分析,模型见式(1)。其中本文重点关注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银行监管压力的回归系数 β_2 ,该指标在统计上显著,说明逆周期资本监管可通过银行监管压力途径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

$$y_{it} = \alpha + \beta_1 BUF_{it} + \gamma P_{it} + \beta_2 BUF_{it} \times P_{it} + \beta_3 BUF_{it} \times GDP_{it} + \beta_4 CON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BUF_{it} 表示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 P_{it} 表示监管压力, $BUF_{it} \times P_{it}$ 表示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监管压力的交叉项,是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因为逆周期资本监管会影响银行资本,进而影响银行监管压力; $BUF_{it} \times GDP_{it}$ 表示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经济增长的交叉项; CON 为一组控制变量。其中, η_i 是个体效应,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1. 逆周期资本监管(BUF_{it})。

BUF_{it}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年份大于等于2013年时,为1;否则,为0。逆周期资本监管计提资本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当经济上行时,预期向好,信贷增加,资本充足上升,银行持有资本缓冲动力下降,风险资产扩大,在此情形下,监管当局要求银行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资本,抑制信贷过快增长,减少银行信贷风险。

2. 监管压力(P_{it})。

参考Jacques和Nigro(1997)、Ediz et al(1998)、Nada和Andrew(2010)关于商业银行所承受监管压力的指标构建方法, P_{it} 定义为最低资本要求与各样本银行资本充足率之间的差值,该值越大,说明样本银行在考察期内面临的监管压力越大^[14]。商业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和最低资本要求的距离如果在0%~2%,则表示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管压力为预警压力;如果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最低资本要求的距离小于0%,则认为商业银行面临着惩罚压力(Rime 2001;朱建武,2006;王擎和吴玮,2012),在此,本文统称为监管压力。银监会在2010年下发了《2010年大型银行监管工作意见》,银监会明确了对资本充足率11.5%的监管红线,2012年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11.5%和10.5%的最低资本要求,结合2013年实施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所以最低资本要求标准按照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

性分别要求。

在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变情况下,监管压力大小会受到逆周期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假设银行基于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吸收贷款损失、避免特许权价值丧失等目的而持有高于最低资本要求2%的资本缓冲,若监管当局实施1%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使得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增加了1%,虽未改变银行持有的资本缓冲水平及其目的,但是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实施,缩短了银行资本充足率与监管最低资本要求的距离,加大了银行监管压力。倘若监管当局根据经济需要计提了2%逆周期资本监管,则银行不仅监管压力变大,从预警压力变为惩罚压力,而且会严重影响其信贷风险。根据资本“缓冲”理论,银行为避免违背资本监管要求所导致的惩罚,具有增加资本和降低风险的激励(Rime, 2001)。此外,监管压力加大,也会改变银行资本缓冲结构。根据银监会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对于信用贷款与抵押贷款、公司贷款和个人贷款风险权重系数的不同规定,银行会根据自身资本水平选择贷款方式、对象(吴玮,2011)。对于处于不同压力水平的银行来说,监管压力越大,逆周期资本监管对其信贷影响越大。当逆周期资本监管要求为1%时,与一个监管压力水平为2%的银行相比,监管压力水平为1%的银行,逆周期监管资本增加,消耗了更多的银行资本,银行需要补充缓释资本以满足监管要求,这种计提行为必然会影响到银行信贷微观操作。因此,银行监管压力函数中必然包含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影响因素,而且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不同监管压力银行信贷也会产生影响。 $P_{it} \times BUF_{it}$ 表示逆周期资本监管以来,监管压力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

3. 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之前研究,本文把其他影响银行信贷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①参考Kishan和Opiela(2000)、Ehrmann et. al(2003)选取了反映银行总资产(TA)的变量:总资产自然对数,是为了控制银行规模对于银行信贷影响;②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ROA),是为了控制银行总资产成本可能对银行信贷的影响;③参考戴金平等(2008)做法,选取了存贷比(DLR),考虑到存贷比指标在2015年10月1日才取消,采用存贷比是为了控制存贷比监管政策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④选取了非利息收入(NI):非利

息收入与总资产比值,是为了控制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对于银行信贷影响;⑤选取了经济增长率(GDP)。杨柳等(2012)、李文泓和罗猛(2011)、田宝和周荣(2010)等认为信贷/GDP指标能够反映银行业系统风险的累积程度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是一个较好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操作指标,而陈忠阳和刘志洋(2014)、胡建华(2013)等则认为信贷/GDP指标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无论信贷/GDP是否能够成为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的依据,仅从逆周期资本监管定义出发,GDP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过程中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因素。同时,贷款需求也是影响银行信贷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率可作为贷款需求的代理变量(刘斌,2005)。在此,全国样本银行采用全国GDP增长率,城市和农村银行采用所在省份GDP增量率为控制变量,以说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以来,GDP增速对于银行信贷影响,即 $BUF \times GDP$ 。

4. 被解释变量。

①信贷增长(LR),该指标是连续两年的贷款对数差分,用来衡量银行的信贷增长。该指标越大,说明银行信贷增长速度越快。②信贷风险(LQ),该指标是银行风险权重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其中风险权重资产主要根据银监会规定的银行风险资产(主要为债权资产)及其加权计算而得。Shrieveas和Dahl(1992)首次使用该指标衡量银行信贷风险水平。与其他指标相比,该值越大,说明银行风险资产越高,贷款资产质量越低。后续Rime(2001)、Roy(2005)、吴俊等(2006)等研究也多使用该指标衡量银行信贷风险。借鉴前期研究,本文也使用该指标衡量银行信贷风险水平。③信贷结构,包括信用结构(DS)、客户结构(CS)和期限结构(QS)。信用结构是信用贷款与抵押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和担保贷款)比值,客户结构是个人贷款(主要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与公司贷款比值,期限结构是短期贷款(一年期以内)与长期贷款(一年期以上)比值。虽然银监会对于短期和长期信贷风险权重没有差别化规定,但是长期贷款不仅可以使得不良贷款发生时间推后,而且从长期贷款构成来看,偏担保贷款或抵押贷款,风险加权重较低,可降低加权风险资产,从而起到降低资本监管压力的作用。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样本选取和统计描述

由于逆周期资本监管是由巴塞尔Ⅲ提出,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监管,本文拟研究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政策效果,属于典型的准自然实验方法,可以有效规避内生性问题。通过对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前后的信贷增长、信贷风险、信贷结构分析,希望探究特殊经济环境下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政策效果。

本文选取我国商业银行从2007—2014年的年报数据^①,包括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农村商业银行,共168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281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质量,本文随机抽取数据库中的数据,并与银行年报数据进行比对,对于wind数据库缺失以及错误的的数据,本文以年报为准,进行修正。

(二) 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1. 银行信贷增长。

对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有效地控制样本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对信贷增长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无法观察到的个体效应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此部分回归模型中,本文重点考察了逆周期资本监管通过监管压力渠道对于银行信贷增长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样本银行按照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了分组讨论。

表1考察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信贷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1)~(4),通过不断添加解释变量及其交叉项,观察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关系。从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信贷增长之间直接关系不显著。从监管压力指标来看,监管压力与银行贷款之间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信贷增长往往较少。因为信贷供给增长会消耗银行更多资本,导致其面临更大的监管压力。但是当实施

^① 选取2007—2014年时间段,主要是考察自次贷危机以来,经济下行特殊环境下,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的政策效果。

表 1 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银行信贷增长

变量名称	信贷增长					
	(1)	总体样本 (2)	(3)	总体样本 (4)	系统重要性银行 (5)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 (6)
LROA	1.327 (1.31)	1.485 (1.14)	1.418 (0.91)	1.129 (0.72)	1.657 (0.39)	1.142 (0.60)
L.TA	-0.148 *** (-16.03)	-0.136 *** (-13.69)	-0.144 *** (-13.04)	-0.144 *** (-13.09)	-0.124 *** (-6.74)	-0.145 *** (-9.66)
L.IN	-0.0015 (-0.15)	0.0127 (0.89)	0.0130 (0.78)	0.0134 (0.80)	-0.0091 (-0.14)	0.0138 (0.76)
dGDP	-0.594 ***	-0.592 ***	-0.590 ***	-0.637 ***	-0.926 ***	-0.615 ***
BUF	0.0011 (0.10)	-0.0085 (-0.74)	0.0083 (0.47)	0.0383 (1.19)	0.0166 (0.30)	0.0310 (1.01)
L.P		-0.0011 *** (-3.26)	-0.0058 *** (-4.63)	-0.0059 *** (-4.69)	-0.0027 (-0.54)	-0.0059 *** (-4.24)
BUF* P			0.0068* (1.73)	0.0074* (1.85)	0.0064 (1.05)	0.0085** (2.46)
BUF* GDP				0.508* (1.72)	-0.430 (-0.78)	0.519** (2.17)
_cons	2.318 *** (16.33)	2.173 *** (14.28)	2.273 *** (13.52)	2.287 *** (13.61)	2.525 *** (7.92)	2.223 *** (9.36)
N	991	866	761	761	97	664
adj. R-sq	0.208	0.169	0.128	0.131	0.491	0.332

注: (1) 表中各个解释变量第一行为参数估计系数,第二行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其中 L.IN 回归参数估计值做了乘 100 处理。

(2)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 2、表 3 同。

表 2 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银行信贷风险

变量名称	信贷风险					
	总体样本 (1)	总体样本 (2)	总体样本 (3)	总体样本 (4)	系统重要性银行 (5)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 (6)
L.ROA	6111.8 (0.53)	7406.3 (0.64)	63498.4 *** (4.77)	63999.9 *** (3.72)	53601.8* (1.99)	62821.1 *** (3.44)
TA	84.44 (0.63)	264.1** (2.01)	134.8 (1.61)	130.6 (0.99)	509.3** (2.72)	79.2 (0.55)
L.DLR	-72.76 (-0.33)	-119.1 (-0.60)	-251.2* (-1.68)	-251.9 (-1.41)	-2036.1** (-2.50)	-211.2 (-1.14)
L.IN	0.235 (0.21)	-0.302 (-0.25)	1.672 (1.32)	1.621 (1.15)	-8.317** (-2.36)	1.74 (1.2)
L.dGDP	1350.0* (1.86)	1367.6** (1.98)	1541.7** (2.4)	1461.7** (2.06)	-716.4 (-0.86)	2061.3** (2.52)
BUF	557.7 *** (3.83)	442.9 *** (3.09)	403.5 *** (3.48)	644.8 *** (3.28)	2886.6 *** (3.47)	692.6 *** (3.33)
P		60.62** (2.49)	61.06 *** (2.88)	59.42** (2.59)	78.97* (1.95)	61.95** (2.55)
L.BUF* P			-120.3 *** (-3.81)	-126.9 *** (-2.64)	-851.4** (-2.89)	-132.4 *** (-2.72)
BUF* GDP				-2824.6* (-1.92)	-25782.7 *** (-3.14)	-2634.1* (-1.80)
_cons	4191.4** (2.03)	1657.8 (0.86)	3147.6** (2.5)	3220.1 (1.65)	-1017.5 (-0.30)	3914.7* (1.89)
N	594	589	569	569	79	490
adj. R-sq	0.09	0.134	0.121	0.194	0.48	0.194

逆周期资本监管后,情况却有所不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逆周期资本监管和监管压力交叉项与银行信贷增长之间在1%水平上显著且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在样本特殊考察期内(经济下行),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可提高监管压力较大银行信贷增长。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逆周期信贷供给调节效果显著。从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即模型(5)和模型(6),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对于银行信贷增长影响效果主要体现在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原因是系统重要性银行正在转向轻资本消耗型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贷款业务增速呈现出下降趋势,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通过资本计提影响其信贷业务操作空间有限。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其主营资产业务仍然是信贷业务,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对其资本缓冲影响较大,故而会严重影响其信贷增长。这个研究结论和吴玮(2011)提出的资本监管对城市和农村银行更加有效的观点相一致。

在模型(1)~(6)中,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在1%水平上显著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从这个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效果,即经济增长下降,但是信贷供给规模却在增长,充分体现了经济逆周期操作。当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后,政策意图更加清晰。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经济增长交叉项与信贷增长在10%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了自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以来,经济增长伴随着银行贷款供给增长。这些充分体现了逆周期资本监管的逆周期操作意图。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银行信贷增速与银行规模之间在1%水平上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在经济下行情况下,银行资产规模与信贷增长之间并不呈现正向关系,原因可能是银行业务多元化发展,传统信贷业务占比开始下降。同时也间接论证了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影响要大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研究结论。

2. 银行信贷风险。

逆周期资本监管的目的是通过银行信贷供给的逆经济周期性操作,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业稳定。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重点考察逆周期资本监管通过监管压力渠道对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样本银行按照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分组讨论。

表2考察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信贷风险之

间的关系。模型(1)~(4)通过不断添加解释变量及其交叉项,观察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银行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单变量来看,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在1%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说明了自实施逆周期资本监管以来,银行信贷风险提高了,主要原因是银行信贷供给增长了,这可以从表1模型(4)~(6)中得到验证,无论是逆周期资本监管还是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监管压力、经济增长交叉项都与信贷增长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说明逆周期资本监管时期确实出现了银行信贷增长从而导致银行风险资产上升情况。从监管压力单变量来看,监管压力与银行风险之间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即监管压力越大,银行越会承担风险,说明了银行期望通过更多的风险资产来提高预期收益(Rime, 2001; 孔德兰等, 2008)。但是从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监管压力交叉项来看,却与信贷风险呈现出了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在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期间,监管压力较大的银行会放弃冒进策略,采用更加谨慎的减少风险策略,这不仅验证了“资本缓冲”理论,而且还说明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从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组的回归结论来看,影响结果也是显著的。总之,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无论是系统重要性还是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越大,越会降低其风险承担,说明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风险管控效果显著。

从逆周期资本监管与经济增长之间交叉项来看,与银行信贷风险在10%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在逆周期监管政策期间,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银行风险上升,反而出现了银行信贷风险降低的现象,而且从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组回归结论来看,这种关系也是显著的。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逆周期资本监管与银行信贷增长和信贷风险关系的稳健性,本文把监管压力指标改为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银行资本充足率比值,并得出了如下回归结果^①。从参数估计值和显著性

^① 监管压力除了做此改变外,本文根据监管实践,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了分别为8%和10%最低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进行了稳定性检验,结果也支持研究结论。

结果及其关系来看,在信贷增长方面,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提高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信贷增长,且效果主要体现在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方面;在信贷风险方面,逆周期资本监管降低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这些研究结论和前文分析结论一致,说明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四) 银行信贷结构的进一步分析

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除了对于银行信贷增长、信贷风险产生逆周期影响外,逆周期资本监管还会对银行信贷供给中不同信用贷款结构产生影响。参考吴玮(2011)有关资本充足与银行信贷关系的研究指标,本文主要从贷款期限结构、信用结构和客户结构来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信贷结构

	信用贷款/抵押 贷款 (1)	短期贷款/长期 贷款 (2)	个人贷款/公司 贷款 (3)
BUF	-0.0442 (-0.76)	-0.00773 ** (-2.01)	-0.0532 (-1.22)
P	-0.0008 (-0.69)	-0.0004 (-0.54)	0.0021 (1.16)
L. BUF* P	-0.0123 ** (-2.08)	-0.00459 ** (-2.12)	0.0115 ** (1.99)
L. BUF* GDP	-0.243 (-0.49)	-0.0590 (-1.15)	1.095 *** (2.67)
L. ROA	-3.669 ** (-2.34)	-0.262 (-0.30)	1.495 (0.58)
L. TA	0.0192 *** (5.52)	-0.0110 * (-1.69)	0.0536 *** (2.63)
DLR	0.0129 (0.87)	-0.0145 (-1.40)	-0.0005 (-0.02)
L. IN	0.0000 (1.26)	0.0001 (1.26)	-0.0000 (-0.17)
L. dGDP	-0.172 (-0.86)	-0.0809 ** (-2.41)	0.398 ** (2.69)
_cons	0.656 *** (8.02)	1.156 *** (12.61)	-0.584 * (-1.79)
N	477	222	553
adj. R-sq	0.289	0.089	0.183

模型(1)刻画了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信用结构的影响。无论是逆周期资本监管,还是监管压力,单一独立变量对于银行贷款信用结构影响关系都不显著,但是对于面临监管压力越大的银行来说,逆周期资本监管会提高其抵押贷款业务比重,相对降低信用贷款,从而防范信用风险。说明逆周期资本监管通过监管压力渠道对于银行信贷信用结构的重要性影响。从贷款方式来看,银监会2004年

《办法》对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风险系数做出了不同规定。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具有风险缓释作用,一般取得与其抵押物相同风险权重。相对之下,信用贷款不能提供风险缓释,其风险加权系数则为100%。故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后,出于降低风险资产、减少面临监管压力的考虑,银行偏好于选择抵押贷款。模型(2)刻画了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与短期/长期贷款在5%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自2013年以来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实施,与短期贷款相比,银行相对提高了长期贷款供给。而且在逆周期资本监管期间,监管压力越大的银行,也偏好于长期贷款,相对减少短期贷款。虽然《办法》并没有直接具体规定不同期限贷款的风险权重,但是长期贷款增加不仅可以减少短期内不良资产的发生,规避风险资产计提占用资本的要求,而且长期贷款多为抵押贷款,资产风险权重相对较低。故自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以来,我国银行偏好增加长期贷款可能部分原因正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模型(3)刻画了逆周期资本监管通过监管压力渠道对于银行贷款客户结构的影响。自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以来,监管压力较大银行会相对提高个人贷款,相应减少公司贷款。从贷款对象来看,《办法》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风险权重系数做出了不同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加权系数为50%,企业贷款风险加权系数为100%。故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后监管压力较大银行,为了降低风险资产,减少面临资本约束,往往偏好于选择个人贷款业务。

实际上,从抵押贷款、个人贷款和长期贷款信贷结构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逆周期资本监管对于银行信贷结构影响的稳健性。个人贷款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长期贷款主要偏向于担保或抵押贷款,银行偏好于这两类贷款说明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银行偏好于抵押贷款这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重点研究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对于银行信贷的影响。通过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①逆周期资本监管可提高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信贷增长。自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放缓,逆周期监管可提高监管压力较大

银行的信贷供给,实现信贷调控的逆周期性。同时,在银行信贷风险方面,逆周期资本监管可降低监管压力较大银行的风险水平,降低其信贷风险。综上所述,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不仅提高了监管压力较大银行信贷增长,而且降低了其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质量,微观效果显著。②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由于对风险资产加权权重的不同监管要求,监管压力较大银行在信贷结构中更侧重于抵押贷款、长期贷款和个人贷款。抵押贷款因具有风险缓释而相对信用贷款具有较低的风险权重,逆周期资本监管会提高监管压力银行对于抵押贷款的偏好。长期贷款一般是担保、抵押等贷款,逆周期资本监管会提高监管压力银行对于长期贷款的偏好。个人贷款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兼具长期性和抵押性,逆周期资本监管会提高监管压力银行对于个人贷款的偏好。此外,本文观察逆周期资本监管时期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的关系,还得出以下结论: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实施后,经济增长与银行贷款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风险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增长伴随着银行信贷供给增加和风险下降。说明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宏观效果显著。

总之,逆周期资本监管实施以来,我国银行信贷供给提高了,信贷风险改善了,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效果显著。因此,当前时期,银监会要推进逆周期资本监管工作推进,积极引入巴塞尔协议Ⅲ有关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内容,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细化监管准则,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在逆周期资本监管过程中,要重视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区别,关注其各自业务发展的特点,在风险资产计提和计量方面不断改进,重点量化系统重要性银行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风险资产,合理计提资本,提高逆周期监管资本通过监管压力渠道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信贷影响,最终实现逆周期资本监管效果对于所有银行全覆盖,从而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 [1] 邹传伟. 对 BaseⅢ逆周期资本缓冲效果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3(5): 60-72.

- [2] 吴玮. 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基于 175 家商业银行数据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4): 65-82.
- [3] 李文泓, 罗猛.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0(2): 147-157.
- [4] 吴玮. 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行为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1: 80-171.
- [5] Rashmi Harimohan, Benjamin Nelson, How might Macroprudential Capital Policy Affect Credit Conditions? [J].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2014, 54(3): 287-303.
- [6] Shekhar Aiyar, Charles W Calomiris, Tomasz Wieladek. Does Macroprudential Leak? Evidence from a UK Policy Experiment [C].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 2012(445): 1-44.
- [7] 曹森. 留存资本缓冲与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模型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4(5): 1-7.
- [8] 朱太辉. 信贷内生扩张下逆周期资本监管效力的初步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 2012(5): 52-70.
- [9] Ronald E. Shrieves, Drew Dahl. The Relation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Commercial Bank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2(4): 439-457.
- [10] Paul Calema, Rafael Rob. The Impact of Capital-Based Regulation on Bank Risk-Tak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99(4): 317-352.
- [11] R Bichsel, J Bl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Capital in Swiss Commercial Banks: A Panel Study [J].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8): 591-597.
- [12] Joseph G. Haubrich, Paul Wachtel.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Shifts in Commercial Bank Portfolios [J]. Economic Review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1993(3): 2-15.
- [13] 陈伟平, 冯宗宪, 张娜. 资本缓冲对中国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基于审慎监管视角[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5(4): 35-42.
- [14] Nada Mora, Andrew Logan. Shocks to Bank Capital: Evidence from UK Banks at Home and Away [C].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 2010(4): 1-32.

作者简介

许坤,男,安徽全椒人,201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与金融风险。

苏扬,男,北京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方原)